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陈金凤 汪超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研究中心 南昌 330022)

【摘要】 开元十三年(725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封禅;唐玄宗;泰山;道教;政治

【中图分类号】 B9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4)01-0039-06

在中国古代有史明确记载的泰山封禅中,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开元十三年(725年)的封禅无疑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次。众所周知,封禅素与方士、道士关系密切,方士或道士往往成为封禅中重要的人物。以致很多研究泰山封禅的学人,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封禅与方士、道士(道教)相联系。然而,在唐玄宗泰山封禅的整个过程中,竟然没有见到一个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如果考虑到当时唐玄宗的好道情结以及以道修身治国的理念,泰山浓厚的道教特色、封禅文化的道教因子等问题,就会越发感到唐玄宗封禅中没有道士参与的不可思议。笔者试图通过考察唐玄宗封禅的过程及其与道教的关系,揭示唐玄宗开元前期的儒道政治的实质,并对唐玄宗好道信道的问题有更全面更真实的认识。

一、唐玄宗泰山封禅的儒家政治本色

封禅泰山,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前期的重要政治追求。据《旧唐书·崔日用传》载,玄宗登基之初,吏部尚书崔日用即提出封禅泰山,玄宗答以手诏,曰“古者封禅,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此时玄宗虽感于自己德行不足、未臻至道,没有接受崔日用的建议,但赐给了崔日用衣物,“以示元言不酬之信”。表明此时玄宗的内心深处对于封禅还是心有戚戚焉。随着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玄宗封禅的思想日益活跃起来。至开元十二年(724年)时,奏请封禅的呼声已是甚嚣尘上。据《旧唐

书·礼志三》载,当时“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学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尤其是唐玄宗于开元十二年闰十一月居东都洛阳的一个月中,群臣就连续4次上书奏请封禅。《册府元龟·封禅二》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载:第一次,吏部尚书裴崔等文武百官,上书请封东岳,盛赞玄宗“握符提象,出震乘图,英威迈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他们陈情溢于言表“臣幸遭昌运,谬齿周行,咸申就日之诚,愿睹封峦之庆。”对此,玄宗以谦谦君主的样子,手诏作答“难违兆庶之情,未议封崇之礼”表示自己“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三天后,中书令张说、侍中源乾曜等奏请封禅,奏书盛赞玄宗有“大舜之孝敬”、“文王之慈惠”、“夏禹之恭谦”、“帝尧之文思”、“成汤之深仁”、“轩皇之至理”等等。对此,玄宗依旧手诏,推托未允。于是,张说、源乾曜又第三次上书奏请封禅“今四海和平,百蛮率职,莫不含道德之甘实,咀仁义之馨香。”玄宗又一次推托“未能使四海义安,此礼未定也;未能使百蛮效职,此功未成也;焉可以扬景化,告成功?”张说、源乾曜紧接着第四次上奏书“陛下功格上大,泽流厚载;三王之盛,莫能比崇。登封告成,理叶幽赞。”一时间,公卿百官、儒生墨客纷纷献词赋,颂功德,数以百计。此时,玄宗“不得已而从之”,于当年十二月下《允行封禅诏》宣布:为了“敬承群议,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太宗之鸿业”,宣称“自古受命而王者,

【收稿日期】 2013-10-26

【作者简介】 陈金凤(1969-),男,江西万载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易尝不封泰山? 禅梁父, 答厚德, 告成功” “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式遵故实, 有事泰山”。以上臣僚的进言与玄宗的答语, 都是端庄的儒家思维与语调。

为了封禅准备工作的有条不紊, 唐玄宗让宰相张说全面主持相关的事务,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制定封禅礼仪。唐朝封禅仪注由唐初著名儒学大师颜师古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最先创编撰定。此次封禅之礼, 是宰相张说与著名儒士、右散骑常侍徐坚等人, 与礼官们在颜师古“封禅仪注”的基础上反复商议而制定的。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 张说将初定的仪注献上。玄宗十分高兴, 与宰相、礼官欢宴于集仙殿。玄宗提议将集仙殿更名为“集贤殿”; 并宣布张说为集贤书院主管, 徐坚副之。随后不断讨论, 继续修订、完善封禅仪注。毫无疑问, 封禅仪礼贯彻的是儒家的思想。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突厥乘间入寇”, 玄宗采纳兵部郎中裴光庭建议, 邀请四夷君长及各国使臣“从封泰山”。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 玄宗率领文武百官、皇室以及参加典禅的各色人等从洛阳抵泰山, 斋戒之后, 玄宗独与宰相、诸王及典祭礼官自南麓步登山头。玄宗因问前代帝王秘封玉牒之文, 礼部侍郎贺知章对曰: “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 所求各异: 或祷年算, 或思神仙, 其事微密, 是故莫知之。”玄宗曰: “朕今此行, 皆为苍生祈福, 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 使知朕意。”据《唐大诏令集》卷六六《典礼·封禅》所载《开元玉牒文》曰: “有唐天子臣隆基, 敢昭告于昊天上帝: 天启李氏, 运兴土德, 高祖太宗, 受命立极; 高宗升中, 六合殷盛; 中宗绍夏, 继体丕定。上帝眷佑, 锡臣忠武, 底绥内难, 推戴圣父。恭承大宝, 十有三年; 敬告天意, 四海晏然。封祀岱岳, 谢成于天; 子孙百禄, 苍生受福。”玄宗按照自定的“先奠后燔”之仪, 步上封台前坛, 祭拜昊天上帝, 以高祖配享, 玄宗首献, 邠王亚献, 宁王终献。献毕, 瘞玉牒文, 以五色土圆封, 燔柴告天。玄宗心情极为激动, 言道: “今封祀初建, 云物体佑, 皆是卿等辅弼之力, 君臣相保, 勉副天心, 长如今日, 不敢矜怠。”翌日, 行禅于社首山, 祀皇地祇。其禅社首玉册文曰: “惟开元十三年, 岁次乙丑十一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 嗣天子臣隆基, 敢昭告于皇地祇: 臣嗣守鸿名, 膺兹丕运, 率循地义, 以为人极, 夙夜祇若, 迄未敢康。赖坤元隆灵, 锡之景祐, 资植庶类, 屡惟丰年。式展时巡, 报功厚载, 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 备兹瘞礼, 式

表至诚。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飨。”封禅告成, 玄宗下诏大赦天下, 封泰山神为“天齐王”。整个祭典结束后, 唐玄宗在泰山脚下的帐殿受朝觐。文武百官、二王之后、孔子后裔、文士儒生, 无不上书赋颂。突厥、契丹、奚等王, 大食、谢、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等侍子及使臣, 以及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和日南、西竺、苗齿、牂柯、乌浒酋长等, 俱来庆贺。

开元十四年(726年), 为了纪念封禅盛事, 唐玄宗亲自撰书《纪泰山铭》, 九月摩刻于岱顶大观峰, 并令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撰《朝觐坛颂》, 均刻石纪德。其中, 《纪泰山铭》碑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叙述封禅的始因及唐玄宗东封泰山的宏大气派; 第二段考证了封禅的来历, 改革“秘而不传”的封禅旧制, 公开宣称自己是“实欲报玄天之眷命, 为苍一而祈福”; 第三段叙述了封禅仪典的过程, 并颂扬天下太平、民富国强; 第四段是李隆基向昊天上帝表示“永保天禄”的决心; 第五段则以铭文的形式歌颂了高祖、太宗、高宗及中宗、睿宗等五圣的功绩, 进一步表明“至诚动天, 福我万姓”的改革精神, 并谆谆告诫后来者“道在, 名非从欲”, 反映了唐玄宗开元前期的雄心壮志和务实的特点。《纪泰山铭》贯穿着“君权神授”、“福乃祖与”、“敬天法祖”的思想, 儒家思想意识盎然。研究者指出, 封禅作为古代有成就的帝王向上天复命和为百姓祈福的严肃礼仪, 是处在由儒学家们所一再阐发的政治天命观的整个思想系统中的。皇帝祭天封禅铭文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即便是以皇室重道教为特征的朝代, 其政治文化的基本观念和礼仪也基本上是遵照典型的儒教传统。^[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铭文也谓“朕惟宝行三德, 曰慈、俭、谦。”这表明, 玄宗虔信儒家的昊天上帝, 并落实于人事, 又有老子的思想浸润其间, 成为一大特色。^{[2] [P479]}

《唐封泰山乐章·豫和》歌曰: “挹泰坛, 紫泰清。受天命, 报天成。竦皇心, 荐乐声。志上达, 歌下迎。亿上帝, 临下庭。骑日月, 陪列星。嘉视信, 大禧馨。澹神心, 醉皇灵。……”此次唐玄宗的封禅活动, 完全是帝王主导、儒士官僚运作的活动, 从策划封禅到封禅结束, 贯彻的儒家政治文化, 既不见方士、道士参与, 也排除了道教神仙的色彩。这不仅与前代唐高宗的封禅有很大的不同, 也与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的其他封禅不同。曾有不少研究

者称:秦汉封禅泰山,出谋划策的是方士,唐宋封禅泰山,张罗其事的是道士。其对于唐玄宗封禅而言则有悖于事实。

二、唐玄宗泰山封禅不让道士参与的原因

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着天然的联系,从秦汉至明清有史明确记载的12次泰山封禅,除了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封禅外,都有方士或道士活动的影子,道教因子在其中活跃。历史上著名的好道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竟然没有让道士参与封禅事务,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且值得深思的问题。

玄宗李隆基自小受唐朝自建立以来浓厚道教氛围的熏陶,特别是其父睿宗皇帝的影响,与道士关系密切。玄宗尝自言:“(朕)爱自幼龄,即尚玄默”。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政治斗争中,李隆基招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其中即有韩礼、冯道力等道士。《旧唐书·玄宗纪》载:(景龙)四年(710年),“中宗将祠南郊,来朝京师。将行,使术士韩礼筮之,著一茎孑然独立。礼惊曰‘着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当年六月,中宗被毒死后,武氏、韦氏两大集团加紧夺权。道士冯道力、处士刘承祖皆善于占兆,向李隆基表示忠心。说是李隆基所居里名隆庆,时人语讹以“隆”为“龙”;韦庶人称制,改元为唐隆,皆符御名。李隆基登基后,仍与道士密切往来,让道教参与政治。例如,《旧唐书·王琚传》载,玄宗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得到了“好玄象合炼之学”的王琚支持。又如,《旧唐书·叶法善传》载,天师叶法善应召入京,佐辅圣主,凡吉凶动静,必预奏离,宠信有加。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加授叶法善金紫光禄大夫鸿胪越国公,兼京师景龙观主,当时尊宠,莫与为比。又如,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派使者迎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入宫,亲受法篆,呼司马承祯为“道兄”。开元十年(722年),司马承祯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送。又如,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召北帝派创始人、江西南城麻姑山道士邓紫阳至京城,斋于太一宫。其后,唐玄宗派邓紫阳巡察江南三十六郡的道观和各地的道教情况。邓紫阳开元十四年回京城复旨,玄宗赐他道号“紫阳”,并赐他紫罗法衣一副,绢一百匹,赐东京的福唐观和他家乡的龙兴观给他安居修道。唐玄宗也不断从事道教事务。《册府元龟》卷五三《帝王部》载,开元十年(722年)正月,玄宗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每年依法斋醮。”又据泰山岱岳观所藏的《双束碑》记,开元八年

(720年),玄宗曾派道士至泰山投龙合练,旨在“我皇有意于神仙”。唐玄宗很重视道家典籍的整理、教习。先天元年(712年)也就是他即位的第一年,就命太清观主史崇玄等修《一切道经音义》。开元七年(719年)令儒官论证孝经易传老子的注本之长短,开元九年置石柱于景龙观,命司马承祯依蔡邕石柱三体书写《道德经》。开元十年(722年),玄宗开始亲自注解《道德经》。

在早年的开元政治中,唐玄宗崇尚道家的治国理念,他鉴于武则天时期苛政滥刑、穷奢极欲而造成严重社会危机的历史教训,以清静无为之旨治国。唐玄宗上台之初,先后颁布《禁止州县严酷诏》《戒州县扰民敕》《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等命令,强调要实行清静宽简、休养生息之政。唐玄宗此时所用的姚崇、宋璟等贤相,皆以清静为宗旨。正如唐人柳芳《食货论》所说“姚崇、宋璟、苏頌等,皆以骨鯁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凯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同时,自武后建周开始,佛教一直与外姓专权联系在一起,武后、韦后、太平公主等都为专权而崇佛。玄宗要改弦更张,重振唐室,必然要高举自高祖以来李唐一直尊崇的道教旗帜,以抑制佛教。据《混元圣纪》卷八载,唐玄宗尊老子为“万教之祖”,称《道德经》为百家之首,诏文曰“化之元者曰道,道之用者曰德,其义至大,非圣人孰能章之,……我烈祖玄元皇帝,乃发明妙本,汲引生灵,遂述玄经五千言,用救时弊,岂六经之拟。”唐玄宗所以抬高老子和道教的地位,目的是为了神化李唐皇朝,扩大其政治影响。他运用《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施行简政轻刑和与民休息政策,这对他实现“开元之治”起了积极作用。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在《天宝改元制》中说“朕粤自君临,载宏道教,崇清静之化,畅元元之风,庶乎泽及苍生,时臻寿域,积以岁月,未尝懈怠。”同年,他又在《令写元元皇帝真容分送诸道并推恩诏》中说“自临御以来,罔不夙夜,每涤虑凝想,斋心服形,礼谒于尊容,未明而毕事,将三十载矣。盖为天下苍生,以祈多福。”这里玄宗自称好道的行为,尽管是后来追述,有些夸张,但大致还是符合实际的。

然而,开元前期的唐玄宗虽然崇奉道教,但其政治指导思想还是传统的儒家王道思想。^{[3][P68]}自唐玄宗为太子和刚刚上台之时,就秉承着儒家的精神。唐景云二年(711年),实握皇权的李隆基以皇太子身份释奠于太学。翌年,又孔宣父祠庙,于本州取侧近三十户以供洒扫。并再次释奠于国学,追

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并规定每年春秋释奠,以四科弟子曾参从祀,列于二十二贤之上。玄宗在上台的早期是以儒学为本的。又据《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崇儒术》载,开元前期,唐玄宗充分认识到“重学尊儒,兴贤造士,故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所由”,得出“弘我王化,在乎儒术”的结论,确定重儒为王化之本。如在儒家的孝道上,玄宗认为《孝经》为“德教所先”,于开元十年(722年)将亲注的孝经颁行天下,令弘文馆学士元行冲撰《御注孝经疏》。

开元前期,崇道的玄宗并未在全国发展道教,反而对道教加以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例如,《唐会要》卷四九《僧尼所隶》载:开元二年(714年)二月十九日,敕“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仍经所司陈牒检验行后所详。”同年闰二月十三日敕:“僧尼道士女冠等自今后并拜父母。七月十三日下《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尽管这主要是针对佛教,但对道教自然也有一定的约束。唐玄宗本来是信道教养生之术,如太平公主服食赤箭粉,又赠给玄宗。又如《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让皇帝宪传》载,开元初年,玄宗赐诸王长生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永无限极”。但他对神仙方术是有所怀疑并往往敬而远之的。《旧唐书·张果传》载“玄宗初即位,亲访理道及神仙方药之事,及闻变化不测而疑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载“唐玄宗开元十三年”条曰“夏四月,丙辰,上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集贤殿。”九月,丙戌,上谓宰臣曰“《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敕自今州县毋得更奏祥瑞。最终不让道士参与封禅事务,也是抑制道教和“不好神仙”思想的自然结果。据开元十七年(729年)统计,当时,在籍的道士女冠仅一千七百余人。唐玄宗对道教态度及其采取的政策措施,说明了玄宗开元前期在儒学道家政治学术上的推崇,也说明玄宗早期在儒学道家与道教中信仰的是前者。既是对大唐崇儒道之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大唐宗教政策的一种发展。^[4]

封禅源于古代“山岳配天”的思想,本于“以德配天”的理念,因此,封禅典礼成为最隆重盛大的祭天之仪。^[5]依据《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解释“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禘。”汉代班固《白虎通义·封禅》说“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

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禅,以告太平也。”《五经正义》曰“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在封建社会中,帝王封禅泰山,被视为天下太平、国家兴旺的标志。诚如《岱史·历代儒臣封禅论》所言“封禅者,王者开务之大礼也。”封禅泰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隆重的政治和宗教大典。中国社会自古就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执政理念,封禅本身是纯粹的儒家宗法政治行为。玄宗此举,自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并进而昭示以儒为治国之本的政治理念。在儒释道三教鼎立和社会思想多元化的情况下,儒家理论受到严重的挑战和不太景气的情形下,唐玄宗封禅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法性宗教保持了国人的正宗信仰,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总之,玄宗前期在政治方略上推崇儒家的德治、仁政之道和道家修养无为而治、修养生息的方略,在政治上抬高道家道教,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其政治思想还是儒家为本的。因此,尽管唐玄宗信道好道,在泰山封禅之前的统治期间,不断从事道教活动,亲近、敬重的道士也不少,但还是不让道士参与封禅事务。毫无疑问,作为国家最为重要大典的封禅,道士们自然是极其乐意参与的,这毕竟是对道教的巨大宣扬和有益于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然而,玄宗封禅不用道士参与,对道士(道教)无疑是一种抑制。这也可以看出玄宗本人的统治思想是以儒为本的。开元初,唐玄宗英气勃发,以民为本,以皇基为重,务实进取,励精图治,“重人事,不依仙”,没有多少时间顾及长生、享乐。有研究者称,泰山封禅是唐玄宗“好大喜功”粉饰“开元盛世”的产物。^{[6] (P161)}其实,封禅之时的唐玄宗,还是充满着政理智的,政与教有着清晰的分别。因此,封禅泰山固有“好大喜功”之嫌,仍不失一个有为政治家的本色。因此,笔者认为,大而化之地言称唐玄宗“对道教迷恋”,^[7]“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的地位,促进道教的发展”,^{[8] (P253)}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三、唐玄宗封禅泰山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尽管开元十三年(725年)的封禅活动中,完全是由唐玄宗主导、由儒士官僚运作的政治宗教行为,整个过程中,既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的色彩也

很淡薄。然而,由于玄宗的好道性格,由于泰山的道教文化内涵,由于封禅与道教“剪不断,理还乱”的特别关系,此次封禅还是对玄宗时代的道教文化生态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唐玄宗泰山封禅进一步强化了泰山作为道教名山的神圣地位。号称“五岳独尊”的泰山是道教名山,道教历史悠久,底蕴深厚。道教视泰山为神仙所居之洞府和道士理想的修行地,称其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二洞天——蓬玄洞天,系仙人成兴公得道处。道书《五岳真形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说,泰山“乃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天帝之孙,神灵之府也”。泰山神(东岳大帝)为天帝之孙,在山川神中地位极尊。《东岳大帝本纪》谓“泰山乃天帝之孙,群灵之府,主掌人间贵贱尊卑之数,管十八地狱、六案簿、七十六司,生死修短之权”。泰山神神力巨大,除了“主更替王朝、稳固江山”、“泰山治鬼,主人生死贵贱”、“封禅泰山,长生成仙”等功能外,最根本的还是“阴阳交泰,万物发生”。《白虎通义·封禅》曰“王者功成封禅必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儒、道文化在泰山信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因而极得儒、道人士的虔信。道教形成后,历代帝王的泰山封禅、祭祀活动即往往与道教的斋醮活动融为一体。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封泰山神为“天齐王”。这既是唐玄宗对泰山在“五岳”中的文化元宗地位的认定,也是唐玄宗推崇泰山道教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对于巩固泰山作为“天下第一名山”的神山地位,以及促进道教在泰山的传播,都有深远的影响。此后,唐玄宗在泰山展开道教活动。如《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载,唐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茅山宗道士司马承祯向唐玄宗建议“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神也。五岳各有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职……,请别斋祠之所。”玄宗“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东岳祀延禧真人。受此影响,道士纷纷至泰山,或修炼,或建道场做法事,推动着泰山道教跃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封禅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举行的最为神圣的礼仪活动,是宗教性与政治性的结合。^[9]泰山封禅,加速了神仙学说与道家思想的融合,从而为道教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由于国家祭祀系统是在方仙道信仰下统一起来,并在封禅活动中进行,这对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与作为国家礼仪的封禅不断发生联系。道教虽然有自己独特的创世说与神仙谱

系,但它与王朝正统的祭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儒、道两家对于对方各自经典所规定的祭祀思想与礼仪,是相互承认、相互借鉴的。研究者指出:道教与作为国家祭典的封禅活动本有天然的契合之处,从北魏以来,道教力图使自己的仪式与王朝礼仪结合起来,这在南郊和五岳祭祀上都有所体现,而六个多世纪以来首次举行的唐高宗封禅大典中出现了某些道教的因素,正是这一倾向的继续。玄宗时,这一趋势达到高潮,从而有太清宫制度的建立及九宫贵神之列入祀典。^[9]

唐朝自肇建以来,即大力提倡道教,以老子李聃为先祖,借以抬高李唐皇室的政治宗教地位。研究者指出,唐朝皇帝一方面将道教的始祖老子尊为自己的宗祖,设机构将道士作为族亲来加以管理;另一方面又将道教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相联系,将道教仪式引入国家祭祀(如山岳河渎的祭祀)的礼仪之中。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道教的地位,促进了道教的发展。^[10]唐玄宗泰山封禅与老子密切地联系起来,在封禅的核心文献《纪泰山铭》中将老子思想揭示,并以泰山刻石的形式向全国公开宣告了以“老子”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唐玄宗泰山封禅后的开元中后期以及天宝年间,道教在全国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发展,老子及道教地位愈来愈崇高,使唐朝的道教发展臻达鼎盛,这不能说与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毫无关系。

唐代的道士参与政治的意识比较强烈,他们企图通过与李唐皇朝的密切合作,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封禅大典在现实中自然是道士们将道教推广的重要媒介,因此,尽管玄宗封禅泰山没有让道士参与,但道士们还是努力构建自己与此次封禅的关系。例如,唐代戴孚《广异记》载“高宗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从泰山府君所云“后六十年,又合一封”之语来看,这个传说的基本情节可能出现在高宗封禅之时,定型则无疑在玄宗开元十三

年(725年)封禅之后。事件本身的真实与否可以不论,但它真切反映了唐人对封禅大典与道教关系的认识:人间帝王的封禅与否,系由道教的“玉京天帝”决定,通过道士的媒介,则可以早些得知。显然,这个传说是在为高宗、玄宗封禅的合法性进行宗教论证,同时也说明道教(道士)与封禅关系的密切。笔者推测,这个传说的创造者很可能是一名道士,至少是一名有浓厚道教情结的道教信仰者。

总之,唐玄宗的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

与,道教色彩淡薄。这其中并不是唐玄宗不崇道、不好道,而是因为开元前期唐玄宗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对道教神仙方术有所怀疑、为了开元政治限制道教过快发展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唐玄宗举行封禅活动,目的在于张大其开元功业,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虽然封禅意不在道教,客观上却对道教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影响与促进作用。此成为推动唐代道教在玄宗时代发展至鼎盛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杨万江《封禅传统:政治天命观及其前景——〈纪泰山铭〉解读》,《原道》2009年第1期。
- [2]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3] 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4] 余功超、黄鑫《崇道集儒与修道好仙——唐玄宗信仰的两个阶段》,《沧桑》2007年第6期。
- [5] 张继禹《道教五岳配天思想简论》,《中国道教》2009年第5期。
- [6] 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7] 丁放、袁行霈《唐玄宗与盛唐诗坛——以其崇尚道家与道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 [8] 温玉成《河洛文化与宗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9] 雷闻《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4期。
- [10] 白如祥《从岱岳观碑看泰山道教与唐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年4期。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 Xuanzong's Fengshan in Mount Tai and Taoism

CHEN Jin-feng, WANG Chao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Emperor Xuanzong's Fengshan (封禅) activity in thirteen years of Tang dynasty Kaiyuan,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monk and the weak of overtone in Taoism, become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Fengshan activity. It has relations with Emperor Xuanzong's emphasis on the Confusion political, the suspect of the fairy technique of Taoism and the policy of temperate development of Taoism. However, Emperor Xuanzong believes Taoism and uses Taoism to regulate the country. Tai mountain is a famous Taoist mountain, and has natural relationships with Taoism, thus, make the Fengshan has some overtones of Taoist culture inevitably. Emperor Xuanzong's Fengshan in Tai mountain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Key words: FengShan;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Mount Tai; Taoism; Politics

(Tr. Zhang Jing; Cui Xianquan)

(责任编辑 张阳)